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中国古代居民体质人类学研究

朱 泓 著



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中国古代居民体质人类学研究

朱 泓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收入论文 51 篇,其中包括:有关中国古代人种类型划分理论体系方面的论文 5 篇;有关古人种问题综合研究的论文 20 篇;重要的古人骨新资料研究报告 21 篇;牙齿人类学和古 DNA 研究等方面的论文 5 篇。

本书适合考古学、人类学等研究者及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居民体质人类学研究/朱泓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8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ISBN 978-7-03-042329-0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居民—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Q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0695 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肖 兴/封面设计: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2 1/2

字数:750 000

定价:1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 古人种学研究体系（代序）

我于1951年8月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均在第一军医大学工作。很小的时候，父母因工作需要先后随军医大学迁至长春，把我留在天津外祖父家，一直读完小学和初中。1966年8月，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转学到长春，回到父母身边。青少年时期的我就对人类的历史表现出特殊的兴趣，阅读过不少有关中外史学内容的书籍，在所崇拜的众多著名科学家中，郭沫若、裴文中、贾兰坡的名字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68年11月，我与全国各地的“老三届”知识青年一道，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来到吉林省农安县“插队落户”。1971年年底被选调回城，在长春市运输公司当了一名装卸工。1972年10月，我被推荐到吉林省医院卫生学校的口腔专业读中专，毕业后留校担任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教员。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现在，承担体质人类学、人体形态学、人体测量学、古人类学、古病理学和古人种学等方面的教学任务，现在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并兼任系副主任职务。

回想在吉林大学近20年来的学术成长历程，给我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众多前辈师长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因材施教、甘做人梯的良好学风和敬业精神，以至于多年来我一直将“先做人，再做学问”这句话当成自己立身处世的人生格言。

记得还是读大学一年级的時候，那时我们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缺少给学生讲授有关人体解剖课程的专业教师，而学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之前又十分需要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一天，当时任考古教研副主任的林沅老师找我谈话，想让我给高年级的同学讲一堂有关人骨性别年龄鉴定的课程。那时我感到压力很大，虽然这方面的知识对我来说算不上生疏，但我毕竟是一名刚入学不久的学生，大学的讲台在我的心目中太神圣了。在林老师的鼓励下，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先后给76级、77级考古专业和我们78级考古专业的同学讲了这堂课。据同学们反映效果还不错，林沅老师开玩笑地说：“我们这也算是工农兵学员上讲台嘛。”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次，教研室主任张忠培老师找我谈话，他仔细分析了我的知识结构和特长，为我指出了今后学术发展的方向，最后他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旧石器考古和人类学，特别是侧重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能够留在母校任教对我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耀和最高的褒奖，我当时就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张老师的建议。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已经明确了自己今后要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迈上了

我的人类学之路。

1983年初,毕业留校才半年的我刚刚从指导学生进行生产实习的张家口田野考古教学基地返回学校,便接到教研室的通知,送我去四川大学参加一个“体质人类学进修班”的学习,担任主讲教师的是复旦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邵象清教授,进修班的学员是来自全国各高校考古专业的年轻教师和各省、市、自治区文物考古科研部门的青年学者。通过一个学期的刻苦学习,我基本上掌握了有关体质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也对这门学科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人类学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和社会学等学科一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遭到了冷遇,除古人类学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之外,人类学中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几乎都成了空白,人种学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我国大陆学术界中只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数很少的几位学者从事有关中国古人种问题的专门研究。这种状况与我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史和丰富的考古遗存的文物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因此,从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要用一生的时间为改变我国考古人类学教学和科研的落后状况而努力。

1984~1985年,我又受系里的委派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从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潘其风先生进修考古人类学。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全身心地投入到我所热爱的事业中。在潘先生的言传身教下,我不仅系统掌握了考古人类学尤其是古人种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大量国内外资料,更为重要的是,潘先生关于古代人种研究一定要与考古资料、古史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学术思想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影响。

近代体质人类学是在21世纪初由西方学者引入我国的,像这样一种“舶来”的学科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洋味儿”。由于中国的社会人文背景与西方不同,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资料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完全照搬外国的那套研究方法就显得不太合适了。尽管在我国前辈学者的努力下,也创立了一些自己的科学研究模式,但我们的古人种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对个别材料的人种类型鉴定的水平上,而且这种鉴定结论还是用现代人种分类的标准去框定古代人种,显得过于宽泛、笼统,很难为考古学者所接受。

古人种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利用出土的古人骨材料来了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人人类群体之间的体质联系,以及古代各民族与现代各民族之间的种系渊源关系,重建一部中国人种史,进而为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和动力等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人类学方面的依据。以往的研究者多倾向于研究时代较早特别是史前时期的古人种材料,认为这些早期的人种材料意义比较重大,而对那些时代较晚,特别是汉唐以后的材料就不那么十分重视了。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大量的研究实践后我认识到,由于史前时期诸考古学遗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且无文献资料提供的信息可以参考,所以这种由零星的早期材料入手进行研究的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在探讨古代居民种系源流的时候,时代较晚的材料反而更具重要意义。于是在《夏家店上

层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及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一文中，我提出自己的基本研究思路：“在运用人种学的材料来探讨古代居民的族属问题时，最稳妥的方法应是从已知推未知，即从已确定族属或已基本上确定族属的某一考古学文化的资料出发，通过对该文化居民的人种学研究，建立起一个或若干个古代民族的人种学坐标，然后再结合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以及古代文献记载中有关族属源流方面的发展线索，进而对那些未确定族属的考古学文化居民进行人种成分分析，最后从人种学的角度提出对关于该文化居民族属的参考意见。”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被全文译成韩文收入《古代东北亚细亚的民族与文化》（韩国骊江出版社，1994年出版）论文集。本着这种学术思想，多年来我一直特别注重从那些年代较晚、族属比较明确的材料入手，建立古代民族的人种学坐标，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对契丹族、鲜卑族和靺鞨族等北方古代民族的人种研究方面，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人类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动物，人种特征作为一种遗传学性状是他们的自然属性，而文化特征则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因此我认为，在研究古代人类人种类型的时候必须时刻注意考古学材料给我们提供的有关研究对象所拥有的文化内涵。在这种学术思想指导下，我在古人种研究中特别强调文化因素的分析。1989年，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凉城东周时期墓葬人骨研究》中打破以往此类研究通常的惯例，采用对同一时期、同一墓地里埋葬的古代居民首先按经济生活方式进行分类，然后再分别分析其各自所属种族类型的方法，成功地对该墓区东周时期共同使用同一片墓地的牧业民族和农业民族在人种构成方面的异同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成果得到学术界同行的首肯。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兄弟民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构成了多元一体化的中华民族。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形成这种多民族共存共荣的统一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在中原地区存在着一个以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为主体的凝聚核心，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之外，共同的种族遗传学基础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血浓于水”这样一种观念长期以来已成为每一个炎黄子孙共同的心理积淀。因此，运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资料科学地揭示我国古代各民族居民的人种构成情况，对于全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和动力，增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和血肉联系，维护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和统一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着这样的宗旨，我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着力于我国古今各民族种系源流方面的研究，其中特别注意对汉民族种系形成过程的分析。正像我国的民族学多年来一般注重研究少数民族而忽视汉族研究一样，人类学和人种学也很少涉足汉族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对汉唐以后中原地区居民的人种研究完全是一个空白，似乎觉得那时的中原居民已与今天无异，因此已失去研究的意义。这纯属是一个认识方法上的误区。我认为汉族发展壮大历史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她的包容性，历史上众多民族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汉民族的最后形成输送着新鲜血液。所

以,弄清楚各个历史时期汉族及其祖先的人种构成情况,恰恰是我们最终阐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的人种学基础的关键之所在。1990年,我在《人类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山东济宁潘庙汉代墓葬人骨研究》,开创了对汉唐以后中原地区古代居民进行人种学分析的先例,其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汉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已与本地现代居民接近,而是与现代华南地区居民最为相似。这项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最近日本人类学家松下孝幸先生专程来吉林大学访问,表示希望就“渡来人”课题与我合作进行有关汉代人种方面的研究,以解决日本民族的起源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在进行古代人种问题研究时,方法论方面主要受苏联学术界的影响,甚至在确定种族类型时的具体对照标准都一直采用苏联学者所制定的现代人种变异范围。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用现代人的分类法去套古代人。其结果往往会给人们造成许多误解,以为某某古代民族中含有现代若干区域性人种的多种因素,似乎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存在着很明显的现代各人种成分的混杂现象。而事实上恰好相反,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这完全是由于研究方法造成的混乱局面。为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我广泛调查、收集和鉴定了出土于我国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的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数十份古人种学资料,其中包括大量尚未正式刊布的人类学标本。通过反复地观察、分析和思考,我认为目前已初步具备建立一套中国古代区域性人种鉴别标准的条件,并倾向于将其划分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古西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这种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变革将会使我们的人种鉴定结论更符合古代居民体质构成的实际情况,也更符合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一般法则,因此也更易于为广大考古学者所理解与接受。

人类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目前在西方各国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由于历史的和学科分类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人类学发展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至今仍缺少一个完整的教学和科研体系。古人种学研究有着它自身的一套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不论是对外国学者还是对中国学者来说都是相同的。但是,既然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古代人种,那么我国的古人种学研究在具体方法上就必然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完全照搬外国学者的办法就不一定妥当。例如,美洲的古人种研究对象实际上仅限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印第安人的祖先,相对隔离的古代生态环境和缺少文字记载的历史特点,使得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运用传统的人体测量学,以及牙齿人类学、分子人类学等新方法进行研究。而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国度,历史上的华夏族不仅与国内的众多民族发生着长期、频繁的交往,各民族相互之间长期存在着遗传基因的交流乃至融合的现象,同时还与周邻地区的许多境外民族保持着各种形式的密切的人口往来。此外,我国又拥有举世无双、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史料,为人们了解古代各族之间相互交往、同化、融合的过程,以及一些历史上的民族的消亡等事实提供了有据可查的线索。因此,我认为将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式

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资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研究中国古代人种问题，才是最佳的途径。当然，我们还要积极地吸收现代西方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些新方法和新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我，最终建立起一个具有我国自身特点的古人种学研究体系，使我国的古人种学研究整体水平早日步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就是我毕生最大的夙愿。

（原载《我的学术思想》，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目 录

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中国古人种学研究体系（代序）	(i)
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	(1)
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种族	(14)
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族	(27)
中原地区的古代种族	(35)
中国西北地区的古代种族	(44)
“樊人悬棺”颅骨的人种学分析	(55)
关于殷人与周人的体质类型比较	(63)
从扎赉诺尔汉代居民的体质差异探讨鲜卑族的人种构成	(73)
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及相关问题	(82)
东北古代居民的种族成分研究	(95)
契丹人种初窥	(102)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特征的聚类分析	(114)
契丹族的人种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120)
合水九站青铜时代颅骨的人种学分析	(127)
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类型的聚类分析	(133)
靺鞨人种研究	(141)
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	(157)
本溪庙后山青铜时代居民的种系归属	(168)
东北亚地区古今居民种族类型的比较研究	(176)
老山汉墓女性墓主人的种族类型、DNA 分析和颅像复原	(184)
中国边疆地区汉代以后古人骨的研究	(193)
东胡人种考	(201)
契丹人种考	(205)
探寻东胡遗存——来自生物考古学的新线索	(212)

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族属问题的生物考古学考察	(219)
吉林农安县邢家店北山基地的古代人骨	(230)
扎赉诺尔汉代墓葬第三次发掘出土颅骨的初步研究	(240)
山东济宁潘庙汉代墓葬人骨研究	(250)
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颅骨的人类学特征	(255)
邹县、兖州商周时期墓葬人骨的研究报告	(264)
内蒙古凉城东周时期墓葬人骨研究	(275)
九台关马山石棺墓颅骨的人种学研究	(310)
内蒙古宁城山嘴子辽墓契丹族颅骨的人类学特征	(322)
彰武平安堡青铜时代居民的种族类型	(331)
内蒙古察右前旗庙子沟新石器时代颅骨的人类学特征	(345)
朝阳魏晋时期鲜卑墓葬人骨研究	(355)
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族颅骨的人种学研究	(369)
东灰山墓地人骨的研究	(385)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人类学特征	(400)
杏花村遗址古代人骨研究	(410)
内蒙古敖汉旗水泉遗址出土的青铜时代人骨	(416)
吉林省大安县渔场墓地汉晋时期人骨研究	(431)
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汉墓出土人骨的研究报告	(440)
游邀遗址夏代居民的人类学特征	(449)
禹州瓦店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	(458)
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出土颅骨的种族研究	(469)
青铜—铁器时代人类颞下颌关节的形态学	(479)
山西省忻州市游邀遗址夏代居民牙齿的测量与观察	(485)
内蒙古察右前旗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的形态观察	(495)
中国边疆地区的古代 DNA 研究	(497)
古人骨 DNA 分析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506)
后记	(509)

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

本文所引用的“东北地区”这一概念泛指中国的东北部地区，按目前施行的行政区划大体上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旧称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兴安盟及呼伦贝尔盟。该地区东起长白山地，西至呼伦贝尔草原，北达黑龙江畔，南抵渤海之滨，境内物产丰富，河流纵横，平原、山地、草原交错分布，为人们提供了十分优越的、适合于各种不同经济生活方式的自然生态环境。因此，东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我国各族人民繁衍生息的地方。古代的东北各族人民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引起世人的瞩目。此外，中国东北地区在自然地理位置上又处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境外分别与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西伯利亚及蒙古高原接壤，隔海与日本列岛相望。这就必然使其成为各种不同来源的人口相互交融，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地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孕育下，这里自古以来就成为一个文化类型多样性十分明显的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古代东北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历史舞台上曾先后多次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而对中国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按照中国古史文献资料的记载，在古代的东北大地上，曾先后居住和活动着肃慎、山戎、东胡、秽貊、挹娄、勿吉、乌桓、鲜卑、沃沮、夫余、高句丽、林靺鞨、室韦、库莫奚、契丹、女真、蒙古等诸多民族。这种多民族的特点使得在东北考古学的研究中，族属问题的判定成为一项十分引人注目的课题。对古代居民的遗骸进行人种学方面的考察虽然并不能直接解决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但却可以为探讨该问题提供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人种，或者称作种族，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众所周知，考察民族特征的着眼点主要包括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即侧重于对某一特定人群社会文化属性方面的分析。然而，划分种族的标志则是体质结构上的某些共同的遗传性状，一般是以肤色、眼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以及头型、面型和其他遗传学特征为依据的，即侧重于对其自然生物属性的考察。但是，既然民族和种族都是同一人群所具有的属性，换言之，民族学家和人种学家所要研究的对象都是同一个人群，那么，上述两种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必然会是十分密切的。对我国东北地区古代民族人种成分的分析，必将有助于最终解决这些民族的渊源和流向等重大学术课题，同时对科学地复原该地区各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形成的历史过程，增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方面也大有益处。



在人种起源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可以称之为单一地区起源论。按照这种理论,全世界现代各色人种都拥有一个近期(5万~1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这个在解剖结构、生理功能和文化、技术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的人群一经出现,便迅速地向四面八方迁徙,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进一步分化成为世界各色人种。另一种理论可称之为多地区起源论。这种理论认为现代类型的智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以至直立人演化而来的,各色人种的性状在很久以前便存在区别,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相互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基因的交流,最后演化成为现代各色人种^[1]。

中国的古人类化石发现和研究的结果表明,多地区起源论可能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新智教授对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大荔人、马坝人、金牛山人、山顶洞人等一系列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阶段的重要化石材料进行了详尽地研究,指出在这些中国古人类化石上存在着诸如朝向前方的颧骨、较大的颜面中部扁平度、扁塌的鼻区、水平的额鼻缝,以及很高的铲形门齿、矢状嵴和印加骨出现率等与蒙古人种相一致的特征,表明在这些不同时代的古人类群体之间,以及他们与现代蒙古人种之间有着遗传学方面的联系,从而提出了中国古人类连续性进化的观点^[2]。由此可见,蒙古人种在东亚大陆的起源和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近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阶段甚至更为久远的直立人阶段。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84年秋季,北京大学考古系旧石器时代考古实习队在辽宁省营口市金牛山遗址发现的金牛山人化石^[3]。尽管有关金牛山人的年代问题目前在学术界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据最新的电子自旋共振法和铀系法对比测年的结果为距今23万年左右^[4]。鉴于在金牛山人的头骨上存在着若干项蒙古人种的性状^[5],我们可以断定中国东北地区也是蒙古人种最早出现和活动的地区之一。

目前在东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多较零碎,如建平人^[6]、安图人^[7]、榆树人^[8]等均为个别的骨骼残段、残片或牙齿等材料,难以准确地观察出其种族特征。1934年,在内蒙古海拉尔市附近发现的扎赉诺尔人头骨被认为属于中石器时代^[9]。经研究,扎赉诺尔人具有低颅型的北亚人种特点^[10]。如果对该遗存的年代推断无误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在全新世之初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带有接近北亚蒙古人种某些特征的人群。

新石器时代东北地区的古人种学资料也比较贫乏,有些已经发现并且十分重要的材料,如红山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人骨资料目前尚未正式发表。迄今为止,在有关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的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种学资料仅有出土于黑龙江省密山县新开流遗址的一份资料。新开流文化的这批墓葬发掘于1972年,其年代为距今6080

年 ± 130 年(树轮校正年代)^[11]。从该批墓葬中仅采集到一例可供观察和测量到部分项目的颅骨。据潘其风先生初步观察,该颅骨形体硕大,颅高、颅宽绝对值均很大,颅指数为圆颅型,颅长、高指数为高颅型,颅宽、高指数为中颅型。由耳点间径颇大(140毫米)推测该颅骨也应具有很大的颧宽绝对值。此外,该标本的鼻颧角为150.5度,反映其具有相当扁平的面部形态。因此,潘其风先生推测新开流文化的居民有可能与东北亚蒙古人种的关系比较密切^[12]。

此外,还有一批古代人骨资料在此应该提到。1995年夏季,笔者应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博物馆邵国田馆长的邀请,前去观察、鉴定了一批收藏于该馆的小河沿文化墓葬的人骨。该批骨骼标本的保存情况欠佳,但从这些残破的颅骨中仍可观察到该文化居民的一些基本人类学特征。总的来看,这批颅骨的颅高值较大,应属高颅类型,面部较宽阔而且扁平,同时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颅骨枕部人工变形现象,与大甸子墓地所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一部分居民颇近似。小河沿文化是西拉木伦河流域南部地区的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该文化是介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并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个文化类型。因此,今后继续收集小河沿文化的古人种学资料无疑对深入研究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青铜时代居民的种系源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

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古人种学资料,在东北考古中发现的相对比较丰富一些。总括起来,大致包括赤峰红山后、赤峰夏家店、宁城南山根、宁城小黑石沟、克什克腾旗龙头山、敖汉旗大甸子、彰武平安堡、康平顺山屯、吉林西团山、吉林骚达沟、沈阳郑家洼子、九台关马山、泰来平洋、奉溪庙后山和敖汉旗水泉等15批古人骨标本。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的人类学资料十分丰富,在该墓地中共采集到比较完整、可供观测研究的成年人头骨标本共计134例,其中男性66例,女性68例。潘其风先生对这批人骨进行了详尽地分析,指出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是一个同种系多类型的复合体。他依据头骨的非测量性形态特征结合主要体质特征项目的测量分析,将大甸子颅骨组区分为三个分组。第一分组接近东亚蒙古人种,是中长颅型伴以高颅型和狭颅型,中等的上面高和中等的颧宽,中等的鼻型和中等的眶型,面部扁平度中等;第二分组头骨的形态特征是圆颅型伴以高颅型和中颅型,面型高而阔,上面部较为扁平,鼻型相对稍阔,中低眶型及平颌型;第三分组集中了大甸子墓地中所有受到枕部人工变形影响的头骨,其基本体质特征与第二分组相似,可以视作同一个体质类型。第二、第三分组的主要种族成分亦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但其

头宽及面宽等特征显然有别于东亚人种而显示出存在着北亚蒙古人种的基因成分^[13]。

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大体相仿，即同处于夏纪年范围之内的另一种东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文化——高台山文化分布于下辽河流域。由辽宁省彰武县平安堡遗址采集到一批高台山文化居民的颅骨资料表明，他们具有长颅、高颅和狭颅的特点，以及中等的上面高、较窄的面宽和颇大的面部扁平程度。研究者认为，平安堡青铜时代居民的主要体质特征与东亚蒙古人种相一致，但上面部扁平度较大的特点使其有可能与北亚蒙古人种或东北亚蒙古人种相对比^[14]。

顺山屯遗址位于辽宁省康平县境内，是辽北地区首次经过试掘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年代在公元前 13 世纪前后，相当于商周之际^[15]。在该遗址的墓葬中采集到一批保存情况较好的人骨。经研究表明，顺山屯青铜时代居民具有长颅、狭颅和高颅的特点。此外，其面宽较窄，面高中等，鼻部形态属中鼻型，面部扁平度很大，“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但同时又混入了个别的北亚类型体质因素”^[16]。

在东北地区的众多考古学文化中，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古人种资料最为丰富，研究工作也进行得比较深入。总括起来。目前已了解到的该文化古人骨材料分别出土于红山后、夏家店、南山根、小黑石沟和龙头山等 5 处遗址。根据目前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上述 5 处遗址中，前 4 处被划归“南山根类型”，而第五处被称为“龙头山类型”。该文化年代的上限大致相当于商代晚期或不晚于商周之际，其下限已进入战国时期^[17]。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古人骨最早进行报道的是日本学者三宅宗悦，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出土于赤峰红山后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当时被称作“赤峰第二期文化”）石椁墓中的一批人骨进行了观察和测量^[18]。60 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又对赤峰夏家店、宁城南山根等遗址进行了发掘^[19]。在该两处遗址采集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骨材料，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研究，于 1975 年正式发表了研究结论，指出该两处墓葬的人骨材料所反映的种族特征是一致的，均可归入远东蒙古人种的华北型，但在鼻型和面部扁平度等项体征上又带有一些通古斯人种的倾向。同时还指出该两组人骨“与红山第一住地人骨的体质特征，彼此非常接近，其种族类型基本上也一样”^[20]。1985 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后改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西南的小黑石沟遗址进行了发掘^[21]。在该遗址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其中不仅有西周文化的青铜礼器，还富有独特的自身风格的仿陶器容器，其墓葬规格不亚于中原的诸侯大墓，因此，被认为很可能属于曾与中原争雄的地方霸主的墓葬^[22]。小黑石沟墓地的这批人骨资料交由笔者进行观察、测量和鉴定，通过初步的观测证明其与红山后、夏家店、南山根等古代居民的种族特征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南山根类型”的古代居民是具有共同种系来源的人群。龙头山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是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一处重要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大型聚落遗址，由祭祀区、墓葬区、居住区和石器打制场等遗存组成。经初步研究，采集自龙头山遗

址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骨在基本体质特征上与“南山根类型”各组标本无显著差异,可视为同一体质类型,所不同的只是在个别体征上北亚蒙古人种因素的影响有所增强。

“龙头山组居民的基本体质特征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同时又混入某些北亚类型的体质因素。”^[23]总体上看,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基本体质特征可概括为偏长的中颅型、高颅型、狭颅型、较窄的面宽和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在种族类型上属于“以东亚类型成分占主导地位的东亚、北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24]。

西团山文化是分布于第二松花江流域吉林、长春地区的一种重要的青铜时代文化。关于其年代问题目前仍有争议,比较权威的观点认为该文化存在的时代为公元前一千纪^[25]。西团山文化的人类学资料共计两组:西团山组出土于吉林市西团山遗址;骚达沟组出自吉林市西郊骚达沟的石棺墓地。贾兰坡、颜闾先生在研究了采集自西团山遗址的人骨标本后认为其体质特征属于蒙古人种的通古斯族^[26]。潘其风、韩康信先生对西团山、骚达沟两处遗址的古人骨资料进行了对比研究后,认为贾、颜二人的观点值得商榷,指出这两处西团山文化墓葬出土的人骨在基本体质特征上是一致的,具有东亚和北亚两个亚洲蒙古人种支系相结合的特点^[27]。

关马山遗址位于吉林省九台市附近,1989年夏季,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遗址发掘了一座古代丛葬石棺墓,根据随葬遗物判断其年代大致为战国时期。在该墓中共采集到可供进行人种学观察和测量的古代人类头骨标本18例。经初步研究,这些标本具有中颅型、高颅型和狭颅型相结合的颅部形态,以及较为宽阔而扁平的面型,因而“与东亚、东北亚两个蒙古人种支系表现出更多的接近关系,同时也不能排除在个别体质因素上可能存在着北亚蒙古人种的影响”^[28]。

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位于辽宁省沈阳市西南郊,其时代在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初。族属目前尚无定论,著名考古学家林沅教授认为可能是秽貊、真番、朝鲜等族祖先的遗存^[29]。在该墓地中仅采集到两例残破的头骨,它们具有短而极高的颅型,十分扁平的面型,反映出西伯利亚和远东蒙古人种相结合的形态特点^[30]。

庙后山青铜时代人骨是辽宁省博物馆和本溪市博物馆于1979~1985年从本溪市庙后山古墓葬中发掘和收集的,其¹⁴C测年结果为距今3600~3300年^[31]。经研究,庙后山青铜时代居民具有长颅型、正颅型和狭颅型相结合的特点,面型宽阔而且相当扁平。魏海波、张振标认为庙后山居民的颅骨特征与苏联外贝加尔地区青铜时代居民,以及日本北海道8~12世纪的大岬人最相近^[32]。实际上,庙后山青铜时代居民在种族类型上仍属于东亚蒙古人种,同时也含有某些接近北亚人种的因素。

平洋墓地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泰来县的平洋镇,其年代上限为春秋晚期,下限为战国晚期^[33]。关于其族属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应纳入东胡范畴之内,可进而推定为拓跋鲜卑及其先世^[34]。据潘其风先生研究,平洋墓地的古代居民是一组同种系多类型的群体,其人种类型主要与东北亚蒙古人种接近,同时也与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相关^[35]。

水泉遗址位于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镇水泉村。1995 年 5~7 月,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该遗址的一片战国时期墓地进行了正式发掘, 共清理墓葬 100 余座。从随葬遗物的文化面貌来看, 水泉遗存与分布在大、小凌河流域的“十二台营子类型”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该遗址采集到完整或基本完整的人头骨 30 余例。据笔者在现场鉴定时的初步印象, 水泉墓地居民一般具有中等偏长的颅型、高颅型和狭颅型的特点, 面部较宽而扁平, 应该属于东亚蒙古人种范畴, 同时在面型上反映出某些接近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

三

秦汉时期及其以后的东北地区古人骨资料, 目前已采集并经过研究和观测的并不多, 且主要集中在鲜卑、契丹等民族范围内。这是今后在田野考古工作中需要注意大力加强的一个方面。

目前已发表的被认为属拓跋鲜卑遗存的古人种学资料共计 3 批, 即完工、扎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的人骨标本^[36]。完工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 1961 年和 1963 年考古工作者曾先后两次对其进行了清理发掘^[37], 共采集到 4 例颅骨标本。扎赉诺尔墓地位于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旗的木图那雅河畔, 在 1959 年、1960 年和 1986 年的三次调查和发掘中^[38], 共清理墓葬 46 座, 采集到可供进行观测的成年人头骨 17 例。南杨家营子遗址位于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巴林左旗, 1962 年对该遗址的墓地进行了正式发掘^[39], 采集到 10 例头骨标本。上述三处鲜卑族墓地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汉代, 其中以完工墓地的年代最早, 有人认为可能不晚于公元前 3 世纪^[40]。

上述三处遗址出土的鲜卑族人骨上所反映的种族特征比较复杂。潘其风、韩康信先生首先对完工、南杨家营子和扎赉诺尔墓地前两次发掘所获得的人类学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指出这三组头骨“在成人种方面都归属蒙古大人种, 并且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分支中的西伯利亚(北亚)、北极和东亚蒙古人种, 分别有程度不同的接近关系。完工组显出与北极蒙古人种相似的成分居多, 可能还包含一些西伯利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扎赉诺尔组主要是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 同时, 不排除在某种程度上还杂有一些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南杨家营子组的情况, 同扎赉诺尔组有些类似, 但在该组所见之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 更趋明显”^[41]。笔者于 1989 年对扎赉诺尔墓地第三次发掘出土的 8 例完整头骨进行了观测, 发现这批头骨上的西伯利亚人种性状较之前两次发掘所得标本更为明显^[42]。在系统整理了该遗址先后三次发掘所获得的全部颅骨资料的基础上, 笔者将扎赉诺尔汉代鲜卑族居民分为两个种族类型: A 组代表了一种以西伯利亚人种血统为主体的类型; B 组可归属于西伯利亚人种和北极人种的混血类型。值得注意的是, 在古代对比资料中, 扎赉诺尔 A 组的鲜卑族居民在体

质特征上与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人最为相似，而扎赉诺尔 B 组所具有的特点却十分接近于完工居民^[43]。这就使得扎赉诺尔墓地的鲜卑族居民似乎处于一种介于完工居民和匈奴人之间的过渡位置上。联系到历史上北匈奴西迁以后，大量匈奴人加入鲜卑共同体，“自号鲜卑”的事实，我们似乎可以构想出一部发生在 1 世纪后半叶蒙古大草原上的种族大融合的情景。完工居民所具有的体质特征可能代表了拓跋鲜卑的祖先类型，而诸如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等处鲜卑族人群中的那些明显的西伯利亚人种成分，显然是由于来自匈奴人或者其他与匈奴人具有相同种系渊源的部族基因流入的结果^[44]。

目前已正式发表的与东部鲜卑有关的古人骨资料仅有朝阳鲜卑组一份。该批颅骨标本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和朝阳县十二台乡等处的魏晋时期墓葬。经研究，这批墓葬被认为“是东部鲜卑慕容部建国前的遗存，年代上限可到曹魏初年”^[45]。从颅骨特征所反映的基本种系成分来看，朝阳魏晋时期东部鲜卑居民的主要人种成分应为北亚蒙古人种，只是在诸如面宽略窄一些这样的个别体质因素上或许暗示出该群体中也受到了某些来自东亚蒙古人种的影响^[46]。在古代对比组中，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和契丹族的人类学特征都比较接近，从而显示出他们具有共同的基本种系渊源。

在东北地区发现的辽代契丹族古人骨，目前已正式发表的只有赤峰市宁城县山嘴子辽墓出土的一份资料^[47]。该批人类学资料比较丰富，通过详细地测量、观察和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山嘴子组契丹族颅骨上所体现出的短而阔并且有些偏低的颅型，宽阔而扁平的面型等特征与北亚蒙古人种更为接近。但是，在某些个别的体质因素上，尤其是该组中那些颅型比较高、狭的标本，他们的种系成分中或许与东亚、东北亚人种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48]。另外，还有一份辽代契丹族的人类学资料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的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的豪欠营契丹族墓地，共包括来自三号墓中的一例完整男性颅骨^[49]和发现于六号墓中的一具契丹族女尸^[50]。经研究，三号墓中的男性颅骨反映的种族类型为典型的北亚蒙古人种特点，而六号墓女尸的种系成分中则可能含有某种北亚与东亚蒙古人种相混合的性状^[51]。1996 年秋，笔者应邀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工作站，在那里观察、鉴定了出土于阿鲁科尔沁旗的耶律羽之契丹贵族墓地的全部人骨标本，发现这批贵族基地的材料在种族特征上与山嘴子契丹族平民墓地中的材料十分相似，亦应是以北亚人种为主要种系特征的居民。二者之间仅有的区别是，与山嘴子的标本相比，耶律羽之墓地出土的人骨上北亚蒙古人种的性状似乎表现得更为强烈一些。

综合上面提到的几批契丹族古人种学资料，我们便不难发现，在契丹人的种族成分中主体因素应该是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特征。他们一般都具有圆颅、阔颅和颅型偏低的倾向，同时伴有扁平而宽阔的面部形态。这种典型的契丹族容貌特点，在许多与契丹人题材有关的辽代绘画艺术作品中，曾经有过生动的描绘。而契丹族人种成分中的个别东亚或东北亚蒙古人种因素的存在，则可能是他们与其他民族发生通婚、混血的结果。